



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KEY RESEARCH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 工作简报

第 4 期

(总第 61 期)

2017 年 12 月 30 日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 目 录

- 一、《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 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优秀集刊奖
- 三、荷兰内梅亨大学泰奥·恩格伦教授应邀来我中心作学术讲座
- 四、2017 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 五、《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 年下卷）出刊

主送：教育部社政司

抄送：北京师范大学社科处

## 一、《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隆重召开

2017年10月17日上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瞿林东文集》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在主楼600隆重召开。北京师范大学荣誉教授刘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王宇信，学部委员廖学盛，北京师范大学陈其泰教授、清华大学张国刚教授、北京大学高岱教授、北京市社科院王岗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及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论坛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帆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总编辑李艳辉、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分别致辞。瞿林东教授介绍了本书文集的基本情况，其四十余年的治学历程和研究路径。与会学者对本书的完成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家和先生认为，本书体现了瞿林东先生治史的三个特色，一是“通中有专”，专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二是充分发扬中国史学的传统，为史学致用做出巨大贡献；三是历史、史学史、历史理论评论三个层次特色鲜明。



廖学盛先生高度赞扬了瞿先生“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王宇信先生高度评价了瞿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精神，为社会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陈其泰先生认为瞿林东教授在学术研究中勇于创新，常年坚持以唐代史学作为研究基点进行史学史的研究，并在研究中体现了高度的社会关切，不仅成果丰硕，也具有极

高的社会价值。张国刚教授和高岱教授则对瞿林东先生在国内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队伍建设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后辈的深远影响进行了高度评价。与会学者一致认为，瞿林东先生是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视学术为生命，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勇于创新。《瞿林东文集》是其四十年成果的结晶，是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爱国情怀和学术研究严谨求实精神的最好体现。



《瞿林东文集》共 11 卷，是瞿林东教授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代表性论著的集结，内容既涵盖史学理论、史学批评、史学功用、史学史纲、史学史志等基础性理论著作，也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20 世纪中国史学、中国史学重要人物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关系等专题性著述，全面反映了作者四十余年的治学历程、研究路径，对于了解作者的史学观点及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理论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优秀集刊奖

我中心主任杨共乐教授主编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荣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优秀集刊奖。



近日，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华侨大学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人文社会科学集刊年会上，我中心《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于两百余家集刊中脱颖而出，被评为年度优秀学术集刊。该奖项已经设立四年，用以奖励高水准的代表性集刊。

### 三、荷兰内梅亨大学泰奥·恩格伦教授应邀来我中心 作学术讲座

应我中心刘林海教授的邀请，荷兰内梅亨大学历史人口学教授泰奥·恩格伦于11月13日—17日来中心进行学术交流访问。11月15日下午，恩格伦教授为我中心与历史学院部分师生作了名为《1800—1945年中国与欧洲的婚姻与生育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讲座由刘林海教授主持。



恩格伦教授首先分析了近现代历史人口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理论，其中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变化理论、欧洲人口模式说等，并对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代表性个案研究进行评价，指出其优点与不足。在理论分析之后，恩格伦教授结合自己研究的问题，以近代中国台湾的鹿港和荷兰东南部的内梅亨为比较对象，对这两个曾经非常繁盛的城市的婚姻和生育情况

进行对比分析。他的研究以这两座城市的家庭登记档案为基础史料，辅以文献资料，通过统计分析等手段，尝试对传统的说法进行分析和验证。恩格伦教授认为，总体而言，虽然在结婚时间、结婚率和生育时间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没有节育措施的情况下，实际上这两座城市的生育变化情况大致相同。影响生育的主要是生物学层面的差异，宗教观念及习俗并非决定因素。马尔萨斯等对中国人口发展的看法并不完全正确。恩格伦教授还与在场的师生进行了交流，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恩格伦教授长期从事近现代婚姻家庭与人口史研究，是本领域的著名学者，曾任《家庭史国际季刊》主编、内梅亨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

#### 四、2017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7年12月16日至17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2017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学术论文99篇。会议上,专家学者们围绕中西史学史、史学理论重要问题、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中西史学比较与融通等主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作如下:

一

陈垣先生开创的根柢之学,白寿彝先生开创的贯通之学,刘家和先生开创的中西汇通之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学派特有的学术基因。学者们继承这些优秀的学术传统,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有诸多突破,其研究成果表现出鲜明特色。

求根柢之学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学派的治史传统。与会学者对陈垣先生的治学方法、治学精神进行了深入研究。刘家和(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培基固本、精益求精——学习陈援庵先生史学遗产的点滴体会》的大会主题演讲。刘家和梳理了陈垣先生的学术之路,认为陈垣先生学术入门之途径是目录学,“其中有我们应该学习的基本功”;陈垣先生提倡“读书要知道其人”,因此在研读《书目答问》时,非常重视《书目答问》正文之后的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刘家和指出,



“‘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献’的意思是‘贤者’。如果说《书目答问》前半部的目录正文是张氏作为学政向诸生指教的是‘文’，那么，在其后半部分的附二姓名略中向诸生所指教的则是‘献’”；陈垣先生在对史源学中的“文”与“献”之间相辅相成关系透彻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的体悟，提出史学研究要在史料上“竭泽而渔”。刘家提出，陈垣先生的文献目录之学，为其“一生之学培植了难得的深厚底蕴与博洽潜能”；“援庵先生治学之路，是不断博精相济之路”，充分体现了精思博识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他强调，“先生毕生从事考证，由此门而做出许多研究精品，可是他对自己这种治学之路毫无高调夸张之意”，这种笃实而谨严的学风，“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在史学研究领域的继承和发扬”。

周少川(北京师范大学)(《〈华化考〉与丝路文化研究》)以陈垣先生的代表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它的内容特色及其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地位。他指出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是用现代科学方法开展丝路文化研究的首创著作。《元西域人华化考》严谨的考证、论述和开阔的民族文化史观，至今仍对中外交通史和丝路文化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单磊(湖南大学)的《青年陈垣对赵翼考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一文，以陈垣先生对“奴才”称谓和岳飞被杀之因的考辩为例，阐述陈垣在青年时代对赵翼考论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在20世纪初民族、民主运动激荡的历史背景下，陈垣史学表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反专制思想的色彩。

与会学者继承陈垣先生求根柢之学的优良传统,在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新解。陈金海(中国孔子研究院)(《书写之异与“尊王”之法——〈春秋〉“惠公仲子”三传比析》)对比了《春秋》三传中对隐公元年“惠公仲子”条经文解释的不同。作者经过考辨认为,虽然仲子的身份因三传书写之异而难以确定,但这种书写之异,因其背后“尊王之法”的差异可以得到解释。骆扬(陕西师范大学)(《〈周本纪〉〈鲁周公世家〉所载周公史事引〈书序〉考论》)考辨了《周本纪》与《鲁周公世家》中述周公史事引《书序》的部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司马迁的撰史理念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撰史“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态度谨慎。

与会者传承白寿彝先生开创的贯通之学,不仅有对史学批评、历史编纂等问题的贯通研究,也有在贯通视野下的个案考察。

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作了题为《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中主客体因素的分析》的大会主题演讲。他提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史学批评的成果及其思想的社会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需要更深层次地挖掘。第二,主体的差别,客体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存在,是史学批评作为一种史学现象存在的原因。第三,怎样看待和分析史学批评主体提出问题的主要根据?第四,如何看待史学批评中出现的偏颇?为何出现这种偏颇,根源何在?他进一步指出,史学工作者应当加强自我反省,加强自我修养。史学批评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史学批评史的研究者应该深入探讨史学

批评中存在的主客体上的问题,这才能推进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

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大会发言的题目为《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他提出,深入开展对中国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既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以《史记》《后汉书》为例展示了古代史家体例精当的成就,认为它们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他指出:中国历史编纂学在编纂理论、史书体裁、实录精神等重要方面,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优良传统。“这值得我们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值得大力发掘和总结,以推进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

学者们还就中国史学史上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贯通研究。牛润珍(中国人民大学)做了题为《金代史官制度考》的大会发言。他通过梳理史官制度,分析了史官在保证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中断中所起的作用。他强调要关注少数民族在中国史学中的贡献和地位。王培华(北京师范大学)在《中国历史文献的局限性》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中国历史文献的六大局限,即:重治乱兴衰,轻经济民生;重文学,轻科技;重人类史,轻自然史;重记载男性,很少关注女性;重祖述,轻创新;记事模糊、失实。江湄(首都师范大学)提交的论文为《怎样认识 10 至 13 世纪中华世界的分裂与再统一?》。她对 10 至 13 世纪中国再次从分裂走向统一做了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批判了日本和欧美学术界“内亚史观”或“北亚史观”背后的西方政治文化野心,指出应以全球史的视野重新认识中原农

耕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核心作用,真正说明多元一体的中华世界的历史形成。汪高鑫(北京师范大学)在《贾谊的“过秦”论及其“六经”思想基础》一文中,认为贾谊在继承先秦儒家尤其是荀子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六经”经传内蕴的仁爱、礼治思想。这些“六经”之论,成为其“过秦”历史总结的思想基础。

与会学者从比较的视角对中西史学进行研究,总结异同,力图揭示中西史学的特点及价值。

杨共乐(北京师范大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书写方式探析》)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的书写方式作了细致的考察与剖析。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一立足于问题导向,所用“论证体”,主题清晰,证据合理。卷二及以下各卷以记述史实为主,使用“叙事体”。卷一带有明显的“一家之言”的性质。他指出,尽管早在古典时代,修昔底德就被史学家设定为客观史学的典范,但最客观的史家,也离不开讲一家之言,也难免会有主观思想输出。中西方皆是如此。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思想体系的中国特质》)在世界史背景下,重新思考《大学》的相关问题。他指出,《大学》的体系是一个没有终极本原作最高本体,而且以否定性的相互原则为底线道德来建设理想社会的方案,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质。这对于今天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和思想发展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

学者们对中西方史学理论、史学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胡玉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论文题目是《从 *auspicia patrum* 到

*auspicia plebeii* ——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天命之争》。她认为，*auspicia* 一词（一般被译为“占卜权”）的内涵与中文的“天命”更贴近，可视语境分别译为吉兆、神佑、天命。她剖析了文献中的隐含线索，梳理了平民如何通过宗教手段，逐渐证明自己具有 *auspicia plebeii*，即平民的“天命”的过程。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孔子与柏拉图人才观比较研究》）在治国思想视域下对孔子与柏拉图人才观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和柏拉图在惜才和育贤上都把教育作为推行哲学观、道德观的重要手段，培养贤人的目标一致。二人因所处环境、背景和经历、素质以及思维方式互有不同，他们在教育观上观上也有明显的差异，互有优劣之处。王大庆（中国人民大学）（《从“争”与“让”看古代希腊与古代中国竞争观念的异同》）比较了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竞争”概念。他认为二者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偏向。他强调，对中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是为了更好地对话，而非要分出高下优劣。

## 二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理论。21世纪以来，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受到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加强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史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

廖学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谈了自己在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的体会。他指出，中国的史学工作者要想有所作为，产生一定的国际影响力，必然要加强学习马克

思主义。我们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今思想理论战线存在代表剥削者利益的形形色色的观点、主张进行批驳和斗争，坚决维护和发展有利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学术。既善于发现又坚决捍卫和弘扬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一切有益的成果，又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将这类学术成果加以完善和提高。廖学盛强调，恩格斯在撰写和修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相关著作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优良学风和从善如流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针对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逐渐被边缘化的现象，吴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唯物史观：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强调唯物史观是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具有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科学本性。同时，他指出，唯物史观所建构的对人类社会的系统认知体系，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规律，它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

### 三

学者们对中西史学理论的研究，也同样硕果累累。何平（四川大学）在大会发言《略论晚近世界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中，梳理了近几年来世界史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他认为，新的世界史研究范式浸透着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视角，发展出三个重要研究分支：全球史、跨国史和跨文化研究。他指出，伴随世界史研究范式转型的是，当代历史意识维度的变迁和对世界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的重新定义。孙立新（北京师范大学）在《联邦德国历史记忆的范式转型》一文中，考察了联邦德国二

战历史记忆范式的转型。他认为，二战后，联邦德国在反思历史方面为世人树立了榜样，但在它的历史反思中，也有一股逆流，美化德国历史，淡化纳粹罪行，甚至为纳粹主义进行辩护的右翼思潮开始兴风作浪。他强调，回忆德国民众的苦难并非鼓励寻衅复仇，而是反省战争的残忍。新的记忆范式应当是“德国人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

张昭军（北京师范大学）、宋学勤（中国人民大学）、卞利（南开大学）分别对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区域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张昭军的《文化史研究的三条取径》一文，总结了当前文化史研究中的三条路径，即文化的社会史、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文化史。宋学勤的论文《思想“在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点》指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趋势和研究中暴露出的问题：由于缺乏思想引领，不少区域研究沉溺于地方史料的堆积和单纯事实的叙述。卞利的论文题目为《史论徽学暨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兼论徽学与地方学之间的关系》。他在文章中讨论了徽学在区域史和地方史之间的归属，对区域史与地方史，区域史、地方史与整体史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与会者就史学研究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易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在历史研究中，应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对于事实判断真实性的追求，正是历史研究科学性的体现。然而，由于缺乏评价价值判断的共同标准，价值判断的科学性难以把握。董立河（北京师范大学）认为价值判断在历史研究中至关重要。

历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价值判断隐藏起来,但如果对历史学家的文本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历史学家不能悬置价值判断。历史研究中没有了价值判断,将会“极其乏味”。杨共乐指出,历史事实和价值判断在文本中往往表现出不一致性,在同一个文本中二者是可以被剥离的。当我们进行思想史研究时,历史学家的价值判断即成为历史事实。因此,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相对的。科学主义和历史主义都不能走向极端。

董立河在《“历史理性”概念辨析》一文中阐释了历史理性的内涵。他认为,一方面是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一切历史现象的相对性和多元性,一方面是人类追求历史终极意义和历史客观性的“高贵梦想”,如何在这一张力中重建对于历史理性的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顾晓伟(北京师范大学)(《后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知识客观性的重建》)提出后分析历史哲学家继续借鉴英美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的最新成果,侧重探讨被叙述主义者遮蔽的历史证据及其历史认识论问题,尝试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寻找一条简单且有效的实用主义方案。刘建民(湖北师范大学)在《历史文本的陈述抽取与推演》一文中分析了人工智能与历史文本解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既然允许独立分析历史文本的符号关系,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方法就获得了介入历史研究的前提条件,所以,用“自然语言”来处理历史文本存在可能性。

学者们对重要史家、经典史著进行了深入研究。孙卫国(南开大学)在题为《〈资治通鉴〉与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的大会报告中指出,《资治通鉴》与《纲目》二书对朝鲜世宗朝



政治与史学的重大影响。这反映了中国史学在东亚的影响力。徐松岩（西南大学）（《修昔底德考信方法初探》）详细分析了修昔底德对史料的考信方法。他提出，修昔底德在撰史过程中主要使用了比较考异法、反溯推理法、立录法、比较法或辨异法、计量法、隐微法、推测法和纠错法等八种考信方法。李隆国（北京大学）在《“塔西佗命题”与古典罗马史学的衰落》一文中提出，塔西佗在罗马帝国刚刚步入鼎盛时期，就提出了罗马已经衰落的所谓“塔西佗命题”。塔西佗的判断有其自身的标准，他认为罗马的衰落根源于自由的丧失和帝制的建立。塔西佗的“衰亡模式”对后世史家影响巨大。

在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院院长杨共乐指出：“人文学科要在中国的文化建设中产生重大影响，必须要有建立学派理想。”学派要有鲜明的学术特色。特色的形成离不开传统。“陈垣校长开创的根底之学，白寿彝先生开创的贯通之学，刘家和先生在学习老师传统上开创的中西汇通之学，对北师大史学学科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些年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继承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大批优秀成果出版，大批的作者和作品获得了省部级的奖励，研究成果得到社会的认可并产生广泛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学派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最后，他号召与会者积极应对挑战，在理论、方法、手段等方面有更多的突破，在成果上有更多的积累，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乃至全国历史学学科发展。

## 五、《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下卷）出刊

2017年12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7年下卷)出刊。本卷设立“笔谈”“治学经验谈”“影像、图像史学研究”“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当代学人研究”“外国史学研究”“历史文献学”“书评”等栏目,刊登27篇文稿。所涉范围广,文字风格多样。有雅俗共赏的通论、著名专家的治学心得,也有精深探研的专题专论,还有反映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一年的大事记,以及近一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著要目。

瞿林东的《会通古今有用于世》,结合中国史学史知识,畅谈了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学习体会,认为这篇讲话,提出了“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的重要任务,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具有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杨共乐的《潜心育英才热血铸师魂》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9日视察北京师范大学的讲话,论述教育、教师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责任和庄严使命,认为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应是全国教师努力追求的目标。

晁福林的《浅谈研究生论文写作的十个重要问题》是作者多年治史体验的一次系统总结,对青年学子特别有益。该文总

总结了论文写作需要注意的十个问题：博览群书，丰富知识素养；开动脑筋，慎重选题；恭敬认真地总结相关的学术史；放飞思想，抓住自己思想的闪光点；腹稿粗具与谋篇布局；围绕主题，深入开掘；疏通逻辑，通言畅辞；画龙点睛，确定题目；论文当以学术创新为主线；论文必须多次认真修改，方可定稿。这些问题不仅适合于先秦史论文写作，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论文写作也同样适用。

影像史学、图像史学作为史学的一个新门类近年来受到瞩目。吴琼、危文瀚的《影像史学视野下的城市形象》，透过北京1949年至1966年的纪实影像，运用影像史学理论，描绘和阐释北京的城市形象，是运用影像还原历史的一次具体实践。贾登红的《以图读史：图像史研究中“碎与通”问题的探讨》认为，图像史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碎片化”尚难以避免，研究者应包容、辩证地看待这种现象，在“求通求意”的目标下，推动“碎与通”的转换及融合，拓展与深化图像史学的研究。

青年学者陈安民致力于比较研究，他有意识地对王夫之、维柯的文武关系论进行比较。本卷刊其上篇，即《维柯的文教武功论》。在维柯看来，暴力与战争对推动社会的发展既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武功之后，社会还需要文教疗伤和润泽。在维柯的心目中，中国是文教与武功均衡发展的典范，中国文明具有文武互济的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栏目安排了五篇论文。贾鸿源的《北宋元丰官制著作局的职事官转型》探讨了北宋元丰机构调整对

修史制度的影响,认为改制直接将史馆与著作局对接,著作局不仅从此掌握修纂日历的权力,还标志着其官员开始由寄禄官转为职事官。与前代相比,这是中国修史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范宇焜的《宋代笔记中的“汉书学”》论述了两宋学人研究《汉书》的情景和成就。宋代笔记发达,两宋学人在笔记中对《汉书》做了进一步的注解、考订,并对《汉书》进行评价,反映了宋代“汉书学”的继续发展。李放的《“引古筹今”与社会治理》研究的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史学家顾炎武的史学思想。社会治理思想是顾炎武学术经世的突出表现。他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意在从政治体制上进行改革,使社会治理更加有效;他认为经济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人才是社会治理的保障,教化、礼治、法治等在社会治理方面均有各自的作用。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但在当时更是经世致用学术思潮的旗手。刘国宣的《昭槤的史学实践与理学宗尚》对嘉、道时期的清宗室成员昭槤的《嘯亭杂录》进行了论析,认为该著体现了昭槤的史学实践,有功于乾嘉考据学风行之时日趋衰落的著史传统的复兴。昭槤的经世思想与理学宗尚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作此后学术整体转向的序曲。

“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栏目,周励恒的《章太炎的国学观与其国学教育实践》论述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观,以及在他的国学观指导下的国学教育实践活动。认为国学在章氏心目中不仅是高深的学术,而且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血脉,能够起到塑造国民精神的巨大作用,是必须予以保存并发扬光大的民族瑰宝。章氏一生多次开办国学讲习会,为培养国学人才殚

精竭虑，做出了重大贡献。周文玖的《朱希祖和他的〈中国史学通论〉》论述了民国史学大家朱希祖的行谊及其《中国史学通论》的成就，认为朱希祖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史学通论》则是其作为开拓者的重要体现。王红霞的《顾颉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对顾颉刚的史学批评进行了总结，认为他的史学批评显示了广阔视野，其旨趣在于理性反思。他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性，在批评中贯彻知人论世的人物评价原则。史学批评是顾颉刚进行史学研究的内在动力。张泓林的《邵循正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以邵氏代表作《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为研究对象，从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考察邵循正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贡献。王兴的《夏鼐、曾昭燏交谊论（1935~1949）》以近年新出版的《夏鼐日记》《曾昭燏文集·日记书信卷》为主要材料，细致地梳理了二人的学术交谊，对研究中国近代留学史及学人交往，具有启发意义。

“当代学人研究”栏目刊发的是汪高鑫的《从探究会通思想到成就会通撰述》，论述的是吴怀祺先生的史学研究之路，指出吴怀祺先生的史学研究，是从最初的郑樵史学研究，到宋代史学思想史的梳理，再到贯通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撰述。

“外国史学研究”栏目刊发了3篇文章，分别是余春江的《西西里狄奥多鲁斯史学思想述评》、孙文栋的《试论19世纪以来〈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史学”与“传记”研究传统》、张小忠的《语境中的观念：迈克尔本特利的历史叙事初探》。

这几篇文章，立论扎实，用功甚深。有的文章经过了反复修改，反映了作者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在“历史文献学”栏目，刊发的是朱乐川的《朱希祖致朱遂翔信函考释》和聂文华的《邓广铭先生书信选释》。朱乐川是朱希祖的曾孙，聂文华是邓广铭女儿邓小南教授的弟子，他们为考释书信内容均作了非常细致的工作。他们的文章为研究两位北京大学史学系的著名史学家提供了可贵的史料。

10卷本《瞿林东文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汇集了瞿林东先生的主要学术成果。这是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一件大事。书评栏目中刊发的曲柄睿的《兼高明而尚沉潜》、李珍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理论创新》、胡楚清的《探索通向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路径》分别从总体和某个侧面，对《瞿林东文集》进行了评述，对阐释瞿林东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颇具意义。